

# 七十年来抗美援朝研究述评<sup>\*</sup>

李雅兴 闵雪

[摘要]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已过去70年,这场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场国际性战争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70年来,学术界对抗美援朝战争展开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从研究的进程看,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将研究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从研究内容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诸多领域。目前,由于各种原因,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中国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必将进一步拓展深化,并将引起国际重视。

[关键词]抗美援朝战争;70年;研究述评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20)06-0076-10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紧接着美军相继入侵朝鲜和台湾海峡,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与此同时,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援助”南朝鲜的提案,组织以美军为主的16国参加的“联合国军”入朝作战,使朝鲜问题国际化。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强烈谴责和严重警告,美国却置若罔闻,并越过三八线,其飞机多次侵入中国领空,轰炸我辽宁丹东地区,直接威胁到人民政权的生存和安全。为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安全,中国人民志愿军毅然于1950年10月19日赴朝作战,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出国作战并取得胜利的战争,是一次真正的立国之战,创造了弱国战胜强国的战争奇迹,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及世界战略格局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0年来,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精神一直是中国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精神动力,抗美援朝战争也一直是学术界重点研究的问题。在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70周年之际,系统梳理学术界近70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发展脉络,对于进一步深化党史、军史、新中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和学习,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对近70年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进行综述,希望能对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些启示。

## 一、总体研究概况

70年来,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及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就研究概况而言,我们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朝鲜战争爆发后至志愿军出国作战之前。此阶段的国内相关研究,主要是以痛斥美帝暴行与呼吁大家团结起来保卫和平为核心内容,成为了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序曲。如新华社时事丛刊社编写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宣传手册(第1~7辑)》(新华书店1950年版),许哲编著了《朝鲜问题》(大众书店1950年版),陈翰伯主编了《国际时事学习资料之一——朝鲜战争后的国

<sup>\*</sup> 本文为2020年“湖南省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名师工作室(项目编号20GG043)资金资助”的阶段性成果。

际形势》(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0 年版),中国新民主主义共青团西北工作委员会编辑部出版了《朝鲜人民为祖国的统一而战斗》(北京青年出版社 1950 年版)等。

第二阶段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此阶段以政治宣传与动员为主,开始出现对战争的常规研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入朝作战后,相关研究有所增多,除了继续宣传美帝恶行的政治动员题材外,部队的相关战争记录和经验总结也陆续问世<sup>①</sup>。而关于战时记录及经验总结的著述主要由参与过战争的部队个人或集体编写,公开出版的主要有沈克非的《抗美援朝战伤处理文集》(东北军区后勤卫生部 1952 年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编写的《在朝鲜前线的后方》(人民出版社 1951 年版)和《朝鲜停战谈判问题(1~4 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1 年版),解放军通俗读物编辑部辑编的《祖国的儿女——抗美援朝短篇选集》(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3 年版)等。其中《朝鲜停战谈判问题(1~4 编)》将抗美援朝停战谈判的整个过程按时间顺序依次详细记录,并对战俘问题的处理也做了详细记述,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及时总结作战经验以便夺取最后胜利,1952 年,志愿军总部专门抽调干部,组织编写了长达 40 余万字的《朝鲜战场对美军作战的几个问题》(内部发行),成为军事机关内部最早系统总结抗美援朝经验的重要文献。另外文艺界、社会组织团体也有相关著述,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巴金、魏巍等一批作家组成赴朝慰问团,深入军营写下了纪实性文学,如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1 年版),蒋祖怡的《抗美援朝的英雄们》(浙江人民出版社 1953 版)等。这些作品虽带有文学气韵,但一定程度上,真实反映出了志愿军战士的精神面貌及战争的残酷,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侧面论证材料。

第三阶段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到庐山会议。此阶段以战后经验总结的研究为主,研究的范围开始扩展。随着停战协议的签订,中央军委开始着手组织编写战后经验总结。1956 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经验总结编写委员会编写的《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总结》在内部发行,成为了当时重要的军事作战参考资料。同年,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向所有参战部队征集论文,编辑出版了《志愿军一日》<sup>②</sup>,从作战、后勤等不同角度真实地记述了这场战争的始末,也为后来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线索。这一时期公开发表的著述在坚持了集中对抗美援朝战争回顾的基础上,研究视野有所拓展,如中国军事博物馆 1958 年编辑出版的《抗美援朝战争纪事》<sup>③</sup>不仅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历史,而且对整个朝鲜战争的外延都有所涉及。

第四阶段是庐山会议召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这一时期因为我们党犯了“左”倾错误,学界的研究重点并没有放在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上,而是放置在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相关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上。特别是 1960 年代初期,军事科学院战史部选编了部分毛泽东、中央军委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电报,为后续研究存留了原始资料。而紧接着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的十年“文革”时期,除文艺领域有些许对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事迹改编成的小说出版外,与之相关的研究工作陷入全面停滞状态。

1978 年 12 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伴随着党在各条战线上拨乱反正工作的完成,科学研究逐步恢复并走上正轨,学界全面展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一是恢复并设立了一批专门的研究机构、纪念馆等,对抗美援朝战争展开了专门研究。如军事

① 光明日报编辑部《美帝侵华初期史实》,光明日报出版社 1950 年版;北京师范大学工会历史系小组《美帝侵略中国史话》,光明日报出版社 1950 年版;薛谋洪《国际时事学习资料之二:朝鲜战争前后美帝对全亚洲的侵略》,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0 年版;邓超作《国际时事学习资料之三:美帝军事上的弱点》,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0 年版;陈翰伯《国际时事学习资料之四:朝鲜战争的新发展》,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1 年版;余崇文《新华时事丛刊社编辑:美帝是怎样侵略朝鲜的?》,人民出版社 1950 年版。

② 志愿军一日编辑委员会《志愿军一日》,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版。

③ 中国军事博物馆《抗美援朝战争纪事》,解放军出版社 1958 年版。

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设立了研究室,专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史;总后勤部设抗美援朝后勤经验总结编委会,搜集了抗美援朝战争后勤工作的大量文电资料,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sup>①</sup>《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sup>②</sup>;2010年,辽宁丹东市成立了抗美援朝精神研究会,并联合抗美援朝纪念馆联合创立了会刊《抗美援朝精神研究》,成为专门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抗美援朝精神的重要阵地。

二是国内召开了一系列主题会议,其中不乏重要学术会议,推动了相关研究向纵深发展。其中1986年,北京大学发起了中美关系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中美史学专家就中共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原因、最后得以停的战原因、最后的结果等问题都提出了鲜明的观点,而中国学者针对美国学者的一些误解也做了有关回应,如“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战争”<sup>③</sup>是断章取义的偏解等等。这标志着抗美援朝研究打开了国际交流之门。1987年,沈阳军区司令部和军事科学院在辽宁沈阳召开了首次志愿军战史学术讨论会,军内有关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抗美援朝战争史经验进行了探讨,为抗美援朝战争史的出版作了重要铺垫。1990年,武汉地区军队院校协作中心同湖北省党史学会联合发起了纪念抗美援朝战争4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就抗美援朝的决策问题、意义等作了进一步探讨,为该领域从军事方面的战略战术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和群众运动等多个方面的拓展研究打开了重要窗口。2010年,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研究》杂志社、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联合举办了“抗美援朝决策及其影响”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对一些存在较大争议的问题做了学理性分析和诠释,有力回应了学界的某些质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段时期以来,随着部分档案的公开,抗美援朝研究在国内外掀起了一股研究热潮,这股热潮中夹杂了不少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2020年初,炎黄春秋杂志社主办了“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邀请了诸位抗美援朝亲历者及家属分享他们所经历的朝鲜战争,或是发表对抗美援朝的见解。有专家表达了对抗美援朝未来研究内容的期许,如继续对抗美援朝精神的研究、对诋毁抹黑抗美援朝战争言论的剖析等等。

三是随着国内外一些重要档案、传记和回忆录的公开,国内学者编著了大量专题性研究著作。因此,这一时期被学界大多学者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研究的开始。其中,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出版部出版了《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出版了《毛泽东年谱》,中共党史研究室编辑了《中共党史资料第三十一辑》(1989年版)(含《彭德怀受命率师抗美援朝的前前后后》《建国初期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组织编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等重要文献,拉开了国内集中研究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sup>④</sup>。另外,柴成文、赵勇田合著《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和《板门店谈判——朝鲜战争卷》(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编著《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等,这些著作在充分利用国内外有限的档案资料基础上,或还原历史场景,或挖掘材料背后的学理资源,在对这一历史事件正本清源的同时,也回应了一些曲解抗美援朝战争的争议性观点。

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1994年后,美国和俄国相关历史档案的陆续解密,国内的相关研究在

① 本书编辑委员会《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金盾出版社1986年版。

②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抗美援朝战争卫生工作总结》,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版。

③ [苏]伊万诺夫《艾森豪威尔传》,朱荫枝,马堃麟译,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页。

④ 此时期主要著作还有杜平《在志愿军总部》,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谭旌樵《抗美援朝战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邓力群、马洪、武衡《抗美援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刘宏焯《抗美援朝研究》,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齐德学《朝鲜战争决策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陈忠龙《一场不可避免的较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华庆昭《从雅尔塔到板门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等。

原有论题基础上得以扩充之外,出现了一些新趋势与见解。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焰等编著《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刘金质、杨淮生主编《中国对朝鲜和韩国政策文件汇编:194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收集整理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人民日报刊发的社论、评论,以及一些重要的国家间往来电文和重要讲话等。齐德学编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普及读物《抗美援朝纪实》(华夏出版社1996年版)。沈志华利用当前国内外公布的档案材料,从中、美、苏等国际史关系视角来分析研究编著了《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阶段研究开始从单一的军事史研究向借助国内外档案资料多视域研究过渡。

21世纪初的10年,无论是军事、历史或是外交等方面与抗美援朝战争相关的研究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如军事科学院组织编纂《抗美援朝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编著《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合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等,为研究者们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材料。与此同时,一些学者也组织了国外解密档案的搜集翻译工作,如沈志华主编了《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美对华情报解密》与杨奎松共同主编)其中《朝鲜战争:俄国档案馆的解密文件》搜集翻译了与朝鲜战争有关的700多件俄国档案(含附件)。对于战争的思考,专家学者们继续从军战史、大国关系、高层决策等视角来解读,但较前一阶段,凸显出史料更为详实,对于战争中的一些问题研究日渐达成共识的特征。如出兵决策方面,齐德学的《巨人的较量:抗美援朝高层决策》(辽宁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充分肯定了这一历史决策的正确性;逢先知、李捷的《毛泽东与抗美援朝》(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就附录了16件档案资料,其中就有争议较大的10月2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内容,并附有原手迹图稿;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就在一些热议问题上提出了不同见解;徐焰、吴少京编著的《抗美援朝战争画卷》(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图文并茂地再现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充分肯定了战争期间我国军事和后勤建设方面所做的贡献。此外,还有专家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抗美援朝战争进行了史料梳理、学理论证,进一步有力回应了充斥于学界和社会舆论中的错误解读,无论从学理还是社会效应上,都产生了重要的正向作用<sup>①</sup>。

近十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在论题选择上并没有多少变化,而是更注重对已有论题的进一步探讨。如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次关键性决策,学者们对出兵、几次作战的时机、停战决策等问题上的分歧,鉴于资料的有限,仍处于难以消减状态。比如有不少学者就出兵决策的正确性,从不同视角进行了论证,但在事件的其他决策节点上还有异议<sup>②</sup>。而在军事战争纪实方面,涌现带一定学理研究的著述,学者们利用亲历者回忆或是已公布的史料,从作战的原因、决策的必要性,作战的重

<sup>①</sup> 这一时间段的主要著作还有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林利民《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时事出版社2000年版;双石《开国第一战抗美援朝战争全景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李庆山《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实》,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宋连生《抗美援朝再回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王树增《朝鲜战争秘闻全记录》,解放军出版社2006年版;王波《毛泽东的艰难决策——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决策过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张星星《抗美援朝60年后的回眸》,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版;杨凤安、孟照辉、王天成《我们见证真相抗美援朝亲历者如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等等。

<sup>②</sup> 主要代表作有齐德学《你不了解的抗美援朝战争》,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沈志华《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牛军《冷战时代的中国战略决策》,世界知识出版社2018年版;宋国涛《出兵朝鲜真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李奎《英明决策: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蓝天出版社2014年版;谭江山、王正民《毛泽东·大谋略:中共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决策》,人民日报出版社2016年版;等等。

大意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论证。如袁永生、沈鹤翔的《志愿军老兵忆抗美援朝——将领篇》(共五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杨凤安、王天成的《彭德怀与麦克阿瑟》(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版)、孟昭瑞的《亲历抗美援朝战争》(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年版)、王湘穗、乔良的《割裂世纪的战争——朝鲜1950-1953》(国防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

## 二、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研究涉及面很广,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诸多领域。具体来说,包括政治军事决策、战时经济问题、军事战略战术、停战谈判、战后经验总结问题,评价与意义问题及其他争议性问题,如东北军组建问题、细菌战问题、战俘问题、台湾问题和其它涉及历史虚无主义观点的问题等。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出国之战,抗美援朝战争从同意出兵到最终停战,其中不乏几个重要的决策点。从出兵、几次重大战役到停战谈判的关键决策是非对错,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对此持不同看法。在出兵决策上,学者们就高层决策的出发点、决策过程等方面展开论争。

一是关于抗美援朝出兵决策的研究。在出兵决策决定性因素问题上,绝大多数学者都持肯定观点,认为出兵决策是出于对东北防线和台湾问题等国家安全的考虑,是对邻国朝鲜遭受侵略的驰援,是中共中央领导层慎重考虑作出的艰难抉择,是中共中央的自主决策。但也有学者认为,“毛泽东是为了推进世界革命,为了解放全朝鲜,让中国军民做出重大的牺牲”<sup>①</sup>。在决策过程方面,李捷认为“抗美援朝战争决策,是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国家根本利益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反复权衡斟酌的谨慎决策,也是毛泽东一生经历过的最为艰难的决策”<sup>②</sup>。这在一定程度回应了决策的略欠考虑之说。然而,也有国内外学者依据解密档案曾提出赴朝作战完全是迫于斯大林的施压,即“苏联压力说”。齐德学对比了斯大林给毛泽东的两份电报和毛泽东的一封回电,分析认为,从电报内容不能直接得出毛泽东出兵与否的结论,而应从毛泽东电报内容的真正意图来解读,即中方一旦出兵,苏联会如何做?“中国方面不能不需要苏联方面有个明确的表示,以便中国出兵后更好地把握这场战争……对于出兵抗美援朝斯大林动摇而毛泽东坚定”<sup>③</sup>。学界也较为认同,苏联因素是中国出兵决策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但“中国出兵决策并不是根源于盟国苏联的要求”<sup>④</sup>。从雷英夫对毛泽东当年做出出兵决策的回忆来看,“我国和朝鲜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唇亡齿寒,不论就国际主义来说,还是就爱国主义来说,我们都不能见死不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有个光荣传统和美德,即‘见义勇为’、‘舍己救人’,我们应该发扬它”<sup>⑤</sup>。最终的决策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双重考量结果,并不是根源于斯大林的施压。

针对“出兵决策”乃一言堂之说,有不少学者从危机处理、民主协商等不同视角论证了“在决策过程中,与会者经过慎重讨论,反复权衡利弊得失,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最后取得一致认识……毛泽东也用充分的理由去耐心说服中央决策层的其他成员”<sup>⑥</sup>。因而,最后决策绝非一个人的主张,更不是一个人力压全员的结果。沈志华通过搜集分析俄方公布的自朝鲜战争爆发到最后赴朝作战期间

① 何方《中国在朝鲜战争问题上的教训》,《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

② 李捷《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及其对新中国的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③ 齐德学《志愿军赴朝作战是中共中央的自主决策——是斯大林给毛泽东施加压力还是毛泽东要斯大林表态》,《军事历史》2000年第4期。

④ 牛军《朝鲜战争中中美决策比较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⑤ 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续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⑥ 刘国新《如何认识抗美援朝战争》,《前线》2019年第5期。

档案,主要是中、苏、朝三国领导人的往来电报,认为“苏联压力说”和“安全说”都不对,“决策动机应该是多重的”<sup>①</sup>。概而言之有四个方面,即为社会主义阵营承担责任,是美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引发的革命激情,是出于边境安全问题考虑,是巩固中苏同盟需要。事实上,《毛泽东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对当年出兵决策的整个过程有详细描述,有学者将《年谱》中的决策过程做了梳理,认为“从地缘政治看,是保护世界格局中的东方利益而为”<sup>②</sup>。笔者将其与沈志华通过俄国档案描述的出兵决策过程做了对比,基本上没有大的出入。但高层决策,涉及一些立场、分析问题的观点方法,不同的学者对同样的材料会有不同的解读,加上目前各国公布的资料还有一定局限,因此在决策者意图、动机等方面的分歧在一定时期内会存在。对于出兵决策的评价,学界多从传统意义上的胜利作出了肯定性的评价,也有学者从公共管理学视角来分析肯定,如“在对朝鲜战争爆发这一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决策中,从危机预防、危机准备到危机决策的各个环节,还是比较合理、比较有效的,从而给今天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方面”<sup>③</sup>。

二是关于抗美援朝战争五次战役决策的研究。抗美援朝战争主要由五次规模较大的战役组成,每次战役的决策都直接影响到整个战局的走势。其中争议最大的决策是第二次战役大获全胜后,还该不该继续?从逢先知和李捷整理的资料来看,当时志愿军已经转入休整,准备第二年春天再进行新的反击,然而“美国政府玩弄先停火后谈判,以争取时间准备再战”<sup>④</sup>,让毛泽东不得已作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的对策。而沈志华利用美国方面公布的档案材料认为,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的联合国停战议案中,美国并没有也不能操纵联合国,但是他们预料中国可能会拒绝议案,从而使自己赢得联合国中的多数和支持,于是一改常态地接受了停战的五项提案,“决心进行一次赌博”<sup>⑤</sup>。果然,中国拒绝了联合国议案,“错过了在有利条件下及时停战的历史机会”,导致了战线的拉长,付出了本来可以避免的沉重代价。齐德学认为到底是真拖延还是假停战,首先要看双方的战略目标。美国当时的战略目标并不在三八线而是整个朝鲜,那么,它是真停战还是拖时间,就不得而知了。至于第二次战役后的停战谈判,中方对“五步方案”并没有拒绝,而是提出了相关建议,但是遭到美国没有余地的回绝,“这说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大门是美国而不是中国关闭的”<sup>⑥</sup>。因此拉开第三次战役帷幕的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自己。在这一点上,牛军也认为这是长期以来,美国在很多政治问题上未能兑现诺言与协定,毛泽东对美方此次停战求和已有所戒备。因而,“对美国的极度不信任应该被认为是影响中国停战决策的重大因素”<sup>⑦</sup>。而学者邓峰也论证了“美国利用战俘遣返问题故意拖延停战谈判,成为该谈判久拖不决的真正缘由”<sup>⑧</sup>。在该不该、能不能,到底是谁在拖延的问题上,我们还是要把问题置于当时的作战背景与条件下,而非凭后面的结果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思维去理解、构想和评价。

三是关于最后停战决策的研究。对于最后停战决策问题,学者们在停战决策的时机问题上存在分歧。国内学者大多认为最后的停战决策是整个“边打边谈”方针的最好结果,是美方被迫停战。一方面,“美国统治集团已看到,美国吞并朝鲜,把战火烧到中国大陆的战略图谋已无法实现”;另一方面,兵力与物资的巨大损耗,与战略目标的无法达成,触动了美方“及时止损”的神经,从而真正转

① 沈志华《面临危机的抉择:关于朝鲜战争之中国决策述评(上篇)》,《历史教学问题》2019年第4期。

② 王力《毛泽东抗美援朝决策的心路历程及战略构想》,《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③ 侯松涛《朝鲜战争的爆发与新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在突发事件的视角下》,《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④ 逢先知、李捷《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9页。

⑤ 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6页。

⑥ 齐德学《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史研究的几个焦点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⑦ 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

⑧ 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

向了停战求和。因而其性质可以理解为“是一个妄图独霸世界的帝国主义在侵略战争中遭受年轻的新兴国家的反抗并遏制之后不得不罢手而勉强接受的停战谈判”<sup>①</sup>。就停战时机而言,齐德学认为,“是美国方面已顾不得‘自由世界领袖’的面子,而一再向朝中方面做出服软的表示,做出多种保证,请求尽早停战,而不是中国方面请求他们……这时结束战争是恰当其时”<sup>②</sup>,不存在错失最佳停战时机的说法。同时,“中朝方及时抓住了结束朝鲜战争的有利时机……战场上的劣势以及国际国内的政治压力迫使美国在谈判中妥协……停战和谈是最优的战略选择”<sup>③</sup>。而沈志华认为,第二次战役结束后,是中方停战的最佳时机,但中美最终在第五次战役后才停战,是因为“在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sup>④</sup>。也有学者认为第五次战役后还没到最佳停战时机,即第五次战役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极大地改善了后勤、空防和火力状况,“这种条件下结束朝鲜战争,对中国并不是一种好的选择”<sup>⑤</sup>。

很多学者把战时经济情况作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直接关系到对抗美援朝战争的评价。观点大致分为三类,一类是抗美援朝战争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如金冲及认为,“抗美援朝并没有削弱或拖垮新中国,相反,倒是进一步激发了中国人民中蕴藏的巨大内在力量,对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sup>⑥</sup>。一类认为战争必然会有损失,但抗美援朝战争实现了经济与战争的良性协调互动,即“用抗美援朝战争推动国内建设,又用国内建设保证抗美援朝战争,这创造了现代化战争史上的奇观”<sup>⑦</sup>。还有一类认为,抗美援朝战争给经济带来的是“严重损害”<sup>⑧</sup>。而通过对比分析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数据,我们不难发现,第二种观点为大多数学者接受是不无道理的。

齐德学从军战史角度分析认为,“战争本身要付出经济消耗,也会对本国的经济生产造成不利影响,还会引起有关国家和联盟的经济制裁。但局部战争如不是在本国进行,或只是在本国的局部地区进行,由于多种因素,如人民的爱国热情、改变经济现状的需求、经济的竞争需求等,也会刺激甚至会促进经济的增长”<sup>⑨</sup>。周才方也认为战争必定付出经济代价,但战争刺激了人民“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劳动热情”<sup>⑩</sup>。郭志刚从抗美援朝战争提高民族自信心凝聚力,激发人民生产积极性角度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还加速了国民经济的恢复”<sup>⑪</sup>,并以此论证了抗美援朝战争对经济的反推力。还有董志凯通过详细回顾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五项举措指出,战争虽影响了经济发展,但促成了经济体制迅速走向集中,“创造了三年全面恢复国民经济的奇迹”<sup>⑫</sup>。

由于涉及战争,军事上战略战术和战后经验总结的研究相对较早,所以成果也相对丰富。其中,关于战争过程的叙述、各部队的作战情况记录以及战争中运用的战略战术成为军事部门、机构及院校的研究重点,出版了大量专著,上文已有提及,此处不一一赘述。有学者肯定了抗美援朝停

① 柴成文《毛泽东、周恩来领导朝鲜停战谈判的决策轨迹》,《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国共产党重大历史问题评价》,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9页。

③ 高广国、田新宇《试论抗美援朝战争中停战谈判的博弈》,《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④ 沈志华《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

⑤ 青石《朝鲜停战内幕——来自俄国档案的秘密》,《百年潮》1997年第3期。

⑥ 金冲及《抗美援朝中的两大奇迹》,《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11期。

⑦ 李捷《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的三个问题》,《高校理论战线》2000年第11期。

⑧ 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⑨ 齐德学《抗美援朝战争与当时的中国经济》,《军事历史》2004年第5期。

⑩ 周才方《试析朝鲜战争对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影响》,《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12期。

⑪ 郭志刚《对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问题的认识》,《军事历史》2013年第5期。

⑫ 董志凯《抗美援朝与新中国经济》,《当代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5期。

战谈判,将军事和政治结合,认为“双管齐下方能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获取尽可能大的成功”<sup>①</sup>,且抗美援朝战争为后来运用于军事领域“军事政治仗”或“政治军事仗”提供了模板。

在停战谈判问题上,学者们根据所得资料,做出了不同侧重点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如有学者通过中方材料分析谈判过程;有学者通过国外(美、苏)材料分析谈判意图;有学者则通过总结对比美、英学术界对朝鲜停战谈判研究,并认为要结合“中、美、俄三方档案资料系深入地探讨朝鲜停战谈判”<sup>②</sup>。而国内学者由于语言与文化的局限,大多数都是借鉴中方材料来开展研究,也有少数专家学者利用美、俄公布的档案资料来分析问题。在研究内容上,学者们对停战谈判的认识大同小异。“同”主要体现在,学者们一致认为战俘遣返问题是阻碍停战谈判达成的最大障碍。而双方僵持不下,主要是“出于政治方面而非军事上的考虑”<sup>③</sup>,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妥协,是双方都有所让步的结果,即“两年多的谈判告诉世界的是,美国政府在谈判桌上没有得到的,想在战场上通过飞机大炮的‘辩论’得到的仍然没有得到”<sup>④</sup>。这其中,也有学者看到,战俘遣返问题成为美国干涉台湾问题的策略之一,即“美国和国民党当局在战俘遣返中的互相利用与配合,成为推动‘台湾中立化’政策向‘扶蒋反共’政策转化的重要环节”<sup>⑤</sup>。“异”则是有学者在久谈未决的问题上,认为旧金山会议后是“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而“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心在停战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拖延战争的策略,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sup>⑥</sup>。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认为,美国此刻并没有急于停战之意图,“如果美国急于停战而愿意向中国的立场作出让步,那么,无论苏联如何强硬,都不能阻挡谈判双方迅速达成协议”<sup>⑦</sup>。另外,还有学者就停战谈判中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的谈判智慧做了相关研究,如卜万平的《杰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与朝鲜停战谈判》<sup>⑧</sup>,唐蕊的《略论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为例》<sup>⑨</sup>等。

近70年来,学界对抗美援朝的总体评价是利大于弊,意义重大。但也存在“代价说”“得失说”“打错说”,认为得不偿失。而近些年,学者们从对战争的回忆叙述转向利用档案资料分析战争细节,得出了各不相同的结论。

抗美援朝战争的评价与意义方面,学者们较能达成共识的观点是,战争固然会带来损失,但在这场不得不打的战争中,中国的参战积极意义远大于消极影响。积极意义方面,主要从战略战争目标的实现、对经济的推进、政权的稳固、与苏联关系及国际地位、民族自尊自信、抗美援朝精神形成等诸多积极作用来分析。如从性质上说,“抗美援朝战争是正义的,抗美援朝决策是必要的、正确的”<sup>⑩</sup>。从经济上看,朱佳木在《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sup>⑪</sup>中认为抗美援朝加速了一五计划的推进,也为苏联慷慨援助提供了可能。从战略目标上理解,“抗美援朝不仅给予朝鲜人民以有力的支援,而且对于保卫新中国的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和开展各项建设事业直接起到了保障的作用……给美国的干涉主义以有力的打击和严重的警告,

① 徐奎《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在政治与军事互动中的得与失》,《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6期。

② 邓峰《美英学术界对朝鲜停战谈判的研究》,《冷战国际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③ 赵学功《美国、中国与朝鲜停战谈判中的战俘遣返问题》,《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④ 张兴德《争取停,不怕拖,准备打——回顾抗美援朝期间的停战谈判》,《学习时报》2019年6月5日,第001版。

⑤ 任方《论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中的战俘“自愿遣返”原则》,《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⑥ 沈志华《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⑦ 邓峰《近十余年朝鲜战争研究综述》,《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9期。

⑧ 卜万平《杰出的政治智慧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毛泽东与朝鲜停战谈判》,《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⑨ 唐蕊《略论周恩来的谈判艺术——以抗美援朝战争停战谈判为例》,《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

⑩ 齐德学《如何评价抗美援朝战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7期。

⑪ 朱佳木《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斗争的有力思想武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66页。

为中国争取到了相当长时期的和平建设的环境……抗美援朝战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sup>①</sup>。在国际地位上,“赢得了苏联斯大林的信任,提高了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非拉国家的威望”<sup>②</sup>。在民族自尊自信方面,“抗美援朝战争使中国开始真正拥有了外交层面上的大国影响力”<sup>③</sup>。

而学界也存在一种“代价说”,认为弊大于利,付出的代价过于沉重。“恶化了同美国的关系,失去了解放台湾的机会,牺牲了几十万人的生命,耗费了几十亿美元资财,错失了建国初期大好的经济发展时机”<sup>④</sup>。“使我国丧失了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同发达国家和不少新兴国家进一步拉大了差距……使我国被排除在大半个世界(主要是发达国家)之外,没能跟上世界发展步伐……耽误了台湾问题的解决”<sup>⑤</sup>。对此,李捷认为谈代价过于言重,“说到得失,有不同的算法,可以算小账,也可以算大账。我主张算大账,要看战略得失。首先,打破了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迫使它在事实上承认中国的国际地位。其次,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形象,特别是在亚非国家中的影响日益扩大。再次,加强了同苏联的关系,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和威望大大提高。最后,为国内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赢得了和平的国际环境”<sup>⑥</sup>。徐焰在《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中也提到“衡量一场战争的成败得失,关键在于对比参战者在战前战后的态势及所得利益”<sup>⑦</sup>。从这点看,新中国无论从国际地位,还是政治、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重要胜利。

“打错说”则是学者指出毛泽东曾说过朝鲜战争“是错了,绝对错了。”这说明,毛泽东实际上已经承认抗美援朝不对”<sup>⑧</sup>。后来有学者专门找到其引用原话的背景和场景,指出当时说的这个话并不是指抗美援朝打错了,有点张冠李戴的意思。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结果上,学者们对战略目标为何、是否实现、何种程度的实现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如果用实现毛泽东原先设想的把美帝赶出朝鲜半岛、帮助金日成统一朝鲜的战略目标来衡量,那就不得不承认,结局也只能说是完全失败的”。然而也有学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分析认为,当时中共中央针对战略目标提出了“三种可能”<sup>⑨</sup>,并且“在经过努力后,主客观条件不具备实现战争最好结果时,毛泽东非常及时地调整军事战略目标……结果完全实现了战略预想”<sup>⑩</sup>。另外,对于战争的胜负,还有平局说。但从总体看来,大多数学者都较为认同“中国人民才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sup>⑪</sup>这一观点。

### 三、研究总结与展望

70年来,随着各国相关档案文献的陆续公开,抗美援朝战争研究经历了从原始资料甚少到日渐丰富、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过程,并呈现出以下特征:一是研究范围不断扩大,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文化领域的诸多方面,如朝鲜战争期间中、美、苏、朝之间的相互关系,抗美援朝战争时的军事外交,志愿军军史,抗美援朝军兵种作战史,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军事人物研究等。跨越了

① 沙健孙《抗美援朝战争及其历史意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7期。

② 邱霞《抗美援朝的意义远胜于代价》,《前线》2015年第11期。

③ 丁明《抗美援朝与中国外交及大国地位的确立》,《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④ 彭明《第四座丰碑》,明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6页。

⑤ 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⑥ 李捷《抗美援朝的战略决策及其对新中国的重要意义》,《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6期。

⑦ 徐焰《毛泽东与抗美援朝战争》,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⑧ 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炎黄春秋》2013年第12期。

⑨ 齐德学《驳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军事历史》2018年第6期。

⑩ 吴家庆、李风华《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

⑪ 吴家庆、李风华《谁是朝鲜战争的胜利者》,《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6期。

心理学、管理学、传播学等领域,研究视域不断扩展。二是研究视角从单一到多元,如经济方面,学者从以往大方向谈战争对经济方面的影响,扩展到从统计学角度量化分析战争数据;决策研究方面,从研究决策本身到用管理学危机处理的视角来分析决策缘由等。三是研究队伍从军事机关、军事院校逐步向研究院所、高校,甚至民间机构组织扩大发展。针对近些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对抗美援朝战争历史的歪曲,对其必要性和正义性的否定、抹黑,学者们用史实澄清,并从学理上给予了有力回击,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迄今为止,虽然抗美援朝战争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拓展。从广度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主要集中在战争史研究、战争决策的影响与意义研究、战争背后的国际关系研究等一些老问题上,而跨学科研究不足,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从深度来说,抗美援朝战争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战役的叙述、回顾上,而对某种规律性的解释、归纳和考证不多,因而有很多争议性问题仍有较大讨论空间,如东北军组建问题、细菌战问题、战俘问题、战时台湾问题等以及这些问题延伸出来的诸多问题等,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二是研究资料有待进一步挖掘。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一方面公布资料的范围还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国内学者获取国内外资料的渠道有限,也对该研究有一定影响。目前,国内学者搜集到的资料虽然已涵盖了中、美、俄、韩等国的档案文献,且也有相关机构对相关文献做了大批量翻译,但是在战时联合国军涉及的除美国以外的1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鲜有涉猎,也限制了相关研究的全方位拓展。这些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公布。三是理论研究队伍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待于进一步提升。近年来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愈加重视,但市场经济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短期内难以消除,加之“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才培养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随着老一辈研究者年岁的增长,青年研究者的成长需要时间和条件,研究队伍出现断层,后备队伍数量不足,质量更无从谈起。面对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沉渣泛起,急需一批有深厚理论功底献身科学研究、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sup>①</sup>的研究队伍,加快中国特色话语体系的构建,持续有力地回击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者的观点。

(本文作者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湖南 411105)

[责任编辑:王昌]

<sup>①</sup>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页。